

德、法文学领域“古今之争”辨析

——以现代性时间观念为视野

盛百卉

【摘要】 德、法文学领域的“古今之争”体现了两国知识界在现代化转型期对于时间问题的关切。由于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及地域等多方面差异,法国知识界多信奉“线性时间观”及与之伴生的乐观“历史进步论”,德国知识界则对“线性时间观”态度谨慎,倾向于一种杂糅了“线性时间观”和“轮状时间观”的“文化时间观”。这种“向后看”的文化自觉不仅使德国启蒙界在时间观念上独树一帜,更导致其在现代化转型路径的选择中走上了一条“文化现代化”优于“社会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关键词】 现代性时间观念;线性时间观;轮状时间观;德、法文学领域;“古今之争”

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现代”要求自我确证,所以无论西方思想界还是文学界均或显或隐地显示出对于时间问题的关切。因此,时间观念成为切入那个时代许多问题的重要视角。德、法文学领域在 17、18 世纪相继发生了“古今之争”,尽管论辩背后的时间视野均是“现代”,但由于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及地域等多方面差异,两国思想家显示出迥异的现代性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也促使二者走上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转型道路。

一、“线性时间观”与历史进步论

韦勒克提出:“十七世纪以前,大家都认为,希腊和古罗马大致处于和法国或英国相同的水准。维吉尔和奥维德,贺拉斯,甚至还有荷马,论者在探讨的时候,几乎视为同时侪辈。时代之间存在的时间鸿沟,很少为人意识到,尽管年鉴的客观史尽人皆知。历史发展这一观念的萌芽,包孕于进步的理念,这一理念可以上溯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①韦勒克道出了前现代社会西方人时间观念的模糊。这种模糊可以理解为长时段时间意识即年代感的缺乏,体现为一种静止的世界观。但笔者认为,韦勒克上述结论忽略了一点,即中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就开启了悄然变化的进程。

* 文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102249。

①[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伴随着封建主义解体及世俗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中的居民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生活并非静止,而是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显著变化。早在14、15世纪的中世纪城镇,塔楼钟就已被普遍使用,以满足市民对于较为准确时间的需求,这标志着人类与时间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在宗教改革后,时间的控制权逐渐从处于支配地位的僧侣阶级向世俗社会的普通人转移,计时装置也由教堂的钟表转变为机械钟表。精确计时钟表的诞生成为“线性时间观”的核心意象。因此才会有观点认为:“工业时代的关键引擎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①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线性时间观”产生的历史进步论也在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历史前台。

16世纪初,考古学的发展在左右人们的进化观念上起到关键作用。当时欧洲史前史研究发展起来,古物学家发现石箭和石斧并非自然产品而是人工制品,这促使他们设想在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之前应该还有一个使用石器的时代。根据古物分析,他们判断人类发展应该伴随着“进化”的维度。这个“进化”的维度明显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阶梯”。在“自然阶梯”中,维持传统被看作好事,而变迁则被看作衰败。伴随着世界科学化运动,加入了线性时间维度的“进化阶梯”逐渐排挤了“自然阶梯”,进步理论日盛。

17世纪,随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与“线性时间观”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进步论日盛。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早期,包括亚当·弗格森在内的一批苏格兰学者通过对现生人群的比较研究将他们排成直线的发展序列,并将这些序列一直上溯到史前期。另外,社会中的知识、科技、产品呈几何级累积,这一切都使启蒙思想家更加确信人类历史正在向着更高的层面前进。他们将发展看作人类与生俱来的要求,提出通过消除感性和迷信,人类可以不断进步,社会以及道德都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直线发展的轨迹。英国启蒙运动先驱弗朗西斯·培根就是乐观线性进步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现代人优于古代人:“说到所谓古,人们对它所怀抱的见解是很粗疏而且无当于这字眼本身的。因为只有世界的老迈年龄才算是真正的古,而这种高龄正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享有,并不属于古人所生活过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于我们说来虽是较老,从世界自身说来却是较幼的。我们向老年人而不向青年人求教有关人类事物的更多的知识和较成熟的判断,因为老年人经验丰富,所见所闻所思想的事物都是多而且博,这是很对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希望从我们的这个时代——只要它知道自己的力量并愿奋发表现出来——得到远多于古代所能得到的东西,因为它正是这个世界的较高年龄,其中已堆积和贮藏着许多实验和观察。”^②

培根对于古代和现代的阐释颇有趣味。他将人放在时间与世界(空间)的大背景上交叉对比:在时间维度上,希腊人是古人,我们是现代人;但以世界(空间)为参照系,希腊人对于世界(空间)是年轻的;我们对于世界(空间)则是年老的。因为在时间中累积了无数的实验与观察,所以“年老的”现代人对世界做出更准确的理解。培根对于古代权威含蓄的拒绝关涉到全新的时间观念,以至于17世纪法国“古今之争”中“崇今派”的代表人物丰特耐尔将之引为压制“崇古派”的有力论据。

二、“轮状时间观”与历史循环论

尽管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正如前文所述,在中世纪中期以前,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很模糊。这种模糊的时间意识构成了西方文明起源阶段神话、史诗的基调和底色。

^①L.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34, p. 14.

^②[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6页。

在古希腊神话中,既没有神的成长过程,也没有人的成长过程。雅典娜从宙斯被劈开的头颅出生,出生时就是一位披坚执锐、体态婀娜的成年女神。人类作为神的造物也没有在线性时间中的进化过程。传说普罗米修斯仿造神的样子用泥土造人:他赋予人直立身材,使其能仰望星空;赐予人太阳之火,使其可获取自然的财富并发展文学艺术及各种社会活动。神话中也没有个体人的成长过程,英雄人物一出生就力大无穷、刀枪不入。传说赫拉克勒斯还在摇篮时,天后赫拉派两条蛇去杀害他,但这个早熟的婴儿居然把两条蛇都掐死了。

《圣经》作为希伯来文明的源头,其中也没有清晰的时间意识。文中对于早期人类年龄的记载耐人寻味。亚当在世930年,130岁生下儿子赛特,塞特在世912岁。塞特105岁生下以挪士,以挪士活了905岁。以挪士的儿子该南70岁生玛勒列,他在世910年。亚当、夏娃最著名的后代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当他600岁时大洪水泛滥,洪水退去后他又活了350年,共在世950年。这些对早期人类年龄的记述看似精确,但经不起科学眼光的审视,因为它们明显违背人的生物学特性。此类记载表明,希伯来先民并不具备明晰的时间观念,所以对于创世、人类始祖年龄的描述难免夸大其词。

有观点认为,在文明源头时期造成西方人时间观念模糊的主因是长时段时间意识的缺乏。人类研究表明,初民更倾向于从身边的自然现象中建构对时间的认识。四季的轮回、昼夜的交替、太阳的升落、月亮的圆缺及草木的荣枯等生动的自然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从自然反观自身,建构起一种轮状的时间观念。可以说,“轮状时间观”是人类从自然季节中体悟到的第一种时间结构。正如德格拉齐所指出的,对于古老的人来说,甚至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轮”仍然是一个比“线”更好的时间象征^①。仔细审视古老的西方文明,“轮状时间观”俯仰皆是。

古希腊神话中的时间具有明显的轮状结构。命运三女神在海神忒提斯和人类英雄佩琉斯的婚礼上预言了其子阿喀琉斯的命运,他的英雄业绩、死亡及葬礼。忒提斯竭力帮助阿喀琉斯摆脱命运,她将儿子浸在冥河中使他刀枪不入,将其藏在赛罗斯国王克枚第斯的宫廷里阻止他参战,但这些都无济于事,阿喀琉斯还是朝着预言一步步迈进,就像王子俄狄浦斯无法逃脱杀父娶母的宿命,人生仿佛一个首尾相连的圆环,走了一大圈依然要回到原点。在古希腊神话中,不仅个体生命的时间意象是“轮”,人类发展的时间意象也是“轮”。据记载,人类曾经历三个阶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铜的时代。这些时代的人一代比一代衰败,于是众神纷纷离开大地,最后宙斯决心用大洪水毁灭这批人类。洪水退去后,宙斯创造了第四代的人类,新人类比以前的人类都更加高贵而公正,他们就是半神的英雄们。在神话故事中,人类由黄金时代到最衰败的时代,毁灭后再重新开启新一轮的黄金时代。由此可见,时代的更迭构建起历史循环论的框架。

这种“轮状时间观”在《圣经》中也有类似表达。尽管有观点认为《圣经》体现的是“线性时间观”,但笔者认为,《圣经》文本并不是在产生之初就完全体现出“线性时间观”,而是中世纪神学家不断阐释、建构的结果。比如,身处“两希文明”冲突尖锐化时代的奥古斯丁,他之所以力证《圣经》中的“线性时间观”,目的是为铲除时人头脑中固化的希腊世界图景。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奥古斯丁可以从自身时代及理论期待视野去观照、阐释《圣经》,身处现代的我们也可以依自身的知识背景去分析《圣经》中的时间观念。事实上,尽管奥古斯丁强调《圣经》中的线性时间观,但耶稣纪元纪年体是在18世纪才伴随着科学发展、启蒙运动被最终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圣经》中的线性时间观不是在奥古斯丁时代而是在启蒙时期才伴随着历史进步论凸显出来。《圣经》作为希伯来先民对于久远历史的记载并没有超越人类的第一种时间结构。

^①S. De Grazia,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 p. 467.

回到《圣经》原文本,“轮状时间观”有很多清晰的表达。《圣经》讲述耶稣道成肉身,为洗刷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难。《约翰福音》中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其他两个门徒在墓地中看到耶稣的圣体不见了,只留下裹尸布,耶稣复活并向众门徒显圣。在这个记载中,耶稣由生到死又死而复生,正体现出循环往复的轮状时间结构。故事中的时间不是线性向前,而是首尾相连可以弯折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启示录》中对千禧年的记述。神打败撒旦将其封印一千年,复活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后撒旦又将复活,迷惑人类,当末日审判时,有罪之人将永沉火湖,无罪之人将与神一同得永生。“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①。从上述神的诏语可以看出,千禧年主义其实是对古希腊“轮状时间观”的变形和适应。人类虽然离开“伊甸园”这个黄金时代逐步走向堕落,但当千禧年到来时,人类将与神一同达到永生不死的状态。由是,《圣经》中人类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大循环,伊甸园既是始,又是终,这是“轮状时间观”的典型体现。

启蒙以来,尽管与乐观历史进步论伴生的“线性时间观”勃勃兴起并渐趋成为主流意识,但“轮状时间观”作为人类早期建构的第一种时间原型并没有离开历史舞台。在维柯 1725 年发表的《新科学》中,与“轮状时间观”伴生的历史循环论被赋予了崭新含义。维柯强调对社会事实的研究要采用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方法,对于人和社会的问题,只有采用历史研究方法才是能被理解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在构成了历史的螺旋上升的周期性循环(*corso and ricorso*)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②,即历史绝不重演自身,而是在每一个阶段将过去的事情提升为新的形式。从维柯的表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杂糅了“线性时间观”与“轮状时间观”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发展轨迹的预设。

三、“古今之争”中的现代性时间观

作为启蒙重要阵地的法国和德国,均以文学领域的“古今之争”积极参与了对现代性时间观念的思考。笔者认为,尽管法国和德国都被现代化进程裹挟,但由于地域、经济、历史、文化及传统等多方面差异,两国启蒙思想家对“线性时间观”与“轮状时间观”各有取舍。

自然科学领域的伟大成就使法国思想家更倾向于以“线性时间观”为依托的乐观历史进步论。丰特耐尔、伏尔泰及孔多塞是此论调的典型代表。受知识领域进步论的影响,法国文学界于 1687—1716 年展开了“古今之争”。当时,法语蓬勃发展,大有取代官方拉丁语之势。法语和拉丁语之争,体现出法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自尊及文化自豪。对法语的推崇及自身所处时代的肯定,影响了法国人对于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看法,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被视为先进文化类型的古代权威受到挑战。法国文艺界出现了两个对立派别,各自将推崇的时代奉为时间序列中的优势方。

崇古派主要成员是布瓦洛、拉辛、拉·封丹及拉布吕耶尔,代表了保守封建宫廷思想;崇今派主要成员是查理·佩罗、圣·艾弗蒙及丰特奈尔,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布瓦洛用理性为法国古典主义立法,他认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创造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具有符合理性的绝对美,所以后世艺术家要将其视为永恒的典范加以模仿。查理·佩罗则通过《路易大帝的世纪》一诗向崇古派宣战。他提出,路易十四大帝的时代可以同奥古斯都大帝的时代相媲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创造的文化尽管伟大,但根据进步论的观点,今人肯定能够在古人辉耀下创造出更高的文化成就。他的

^①《圣经·启示录》,第 291、292 页。

^②[美]格奥尔格·伊格尔顿:《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年,第 36 页。

理论盟友丰特耐尔也认为：“古代人是不是优于近代人，只消问一问古代的树是不是大于近代的树，就可以解决。……自然界是并不尊重什么时代的，……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一个根本的要素，而时间是站在天使那一边的。从历史上就可以读到有关这一点的证明，因为经过多少世纪的愚昧和迷信之后，近代世界已经恢复了古代的学术，从野蛮之中成长出来了文明的、有秩序的国家，可以和古人相比美，甚至超过了古人。”^①笔者认为，法国文学领域“古今之争”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线性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念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帮助人们建立了对时间序列中“现在”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使人们头脑中“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得到确证；另一方面，对现代的盲目自信也造成了西方人在文化层面上某种程度的断裂，与“前现代”社会的切割造成了对“自然”和“神祇”的背离。现代人精神领域荒原般的存在状态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在制定现代社会蓝图时所未能预料的。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受法国“古今之争”的影响，德国亦出现了“古今之争”。较之于法国启蒙界对“线性时间观”的崇拜，德国启蒙界对待时间的态度更加复杂。18世纪末，康德虽然用星云学说构想了宇宙的进化，但他否认人类道德会伴随线性时间流逝趋于完善。赫尔德虽然结合康德与维柯的思想提出了涉及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哲学观念，但并没有预见较高形式是从较低形式发展而来。由此可见，德国启蒙界既秉持一种与机械钟表时间相对应的线性时间观，同时又信仰一种形而上的时间观。

德国文学界“古今之争”的第一波是高特舍特代表的莱比锡派与波特玛、布莱丁格代表的苏黎世派的论战。第二波是由莱辛引领的针对莱比锡派、苏黎世派的批评，及席勒引领的针对“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高下评判的艺术史研究。笔者认为，与法国文学界在时间观念中的“当下”指向不同，德国文学界在时间观念上普遍存在“向后看”的怀旧特征。

在第一波论争中，高特舍特虽然对早期德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只是一味照搬、模仿法国，所以他的理论建构和戏剧创作最终都走向了僵化。波特玛、布莱丁格反对高特舍特取自古罗马传统及法国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为了区别以布瓦洛为代表的“伪古典主义传统”即“拉丁（罗马）的文艺复兴”，他们将“向后看”的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古希腊，倡导真正的“古希腊的文艺复兴”。他们诉诸人的“感性”能力，推崇具有感伤气氛的“绘画性的诗歌”，在精神上延续“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的古希腊艺术思想。总的看来，莱比锡派和苏黎世派在时间的序列中都是“怀旧”的，只不过两者分别将目光投向了古罗马或古希腊。

“古今之争”第二波的主导者莱辛与第一波理论家在“崇古”的角度上具有一致性。但莱辛的“崇古”不是跟在古人背后亦步亦趋，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时间意识的“怀旧”者。莱辛主张汲取古希腊优秀文艺精神灌注到德国现代民族戏剧的建构中，创造日耳曼文学自身的辉煌。他用《汉堡剧评》反对法国伪古典主义和高特舍特的盲目模仿。他认为法国伪古典主义的“伪”在于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本义，把自创的蹩脚规则强加在古人头上。高特舍特以高乃依、拉辛的戏剧为蓝本进行创作更是偏离了德意志民族文学发展的正确轨道，合适的路径在于找到德意志民族戏剧与古希腊精神真正的内在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莱辛在时间观念上具有“怀旧”特点，但他又基于历史进步的角度提出，人们无法在时间上真正回到古希腊而只能继承其优秀的艺术精神。所以，他在戏剧题材处理上体现出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理想，塑造了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诸多生动的市民形象。从时间序列上看，“市民戏剧”表现的是“今人”。“今人”虽然是新的、短暂的，但只要塑造得好，也可以成为像古希腊悲剧中那样经典的形象，能够超越线性时间的流逝，体现出永恒不朽的文化价值。

这场论争影响深远，后起之辈纷纷从各自体系出发汲取所需思想资源。将德国“古今之争”的讨

^①[美]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4、115页。

论推向高潮的席勒就从莱辛的思想中受益颇多。席勒曾高度评价莱辛的成就,将其视为德意志民族文学建构的关键人物。席勒认识到,正是莱辛不遗余力地批判法国伪古典主义,荡涤了德意志的“美波门之神地”,才为德意志文化民族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即从自身历史文化、制度文化的深处寻找资源,助力德意志现代化转型。在莱辛之后,席勒也以众多的诗歌创作、哲学书写参与到“古今之争”中。其传记作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认为席勒“把自一个世纪来进行的关于现代和古代之关系的大讨论,那由佩罗推动的‘古今之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①。

笔者认为,军医出身的席勒受过现代科学洗礼,所以他头脑中并不缺乏“线性时间观”。他将这种时间观念沉落进艺术及人类社会发展领域,提出艺术和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在明朝。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席勒虽然认为艺术和人类必将迈向辉煌的明朝,但并不意味着“线性时间观”占据了他的头脑。实际上,“轮状时间观”才是他时间认识的主流。为了建构德意志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为了疗治现代人的精神贫困,他发展出一种“席勒式”的杂糅了“线性时间观”和“轮状时间观”的文化时间观念,表现为“向后看”的强烈指向。

在那个科学兴起、神话衰落的启蒙时代,席勒比前辈先一步预感到理性无节制扩展的危险。他提醒现代人不要忘记在遥远的过去曾与自然、诸神建构起的种种密切联系,古老的人对自然、神祇心存敬畏,也因这份敬畏逐步发展出人类存在的文化层面。在《厄琉西斯的祭奠》一诗中,席勒说道:“野兽在荒野自由来往,/神在太空中自由统治,/他们胸中的强烈的欲望,/都受自然法则的控制;/人处于他们二者之中,/应该团结成天下一家,/只有通过道德之功,/才使他们自由而强大。”^②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影子——“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席勒认为,城邦之外的“神”和“野兽”遵循自然法则,城邦之内的“人”遵循道德原则。即使进入“现代”,人的道德及对社会、国家的义务也不应随着启蒙被取消。否则,人要么堕落成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要么膨胀为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神”。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前现代的文化资源不应全被视为糟粕,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理应成为现代文化建构的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在“历时维度”之外还存在着文化的“共时维度”,由民族土壤中顽强生长出来的思想、情感、德行、意蕴不会随着线性时间流逝而丧失价值,它们都应成为现代人建构“共通感”的基石。席勒首先把德意志视为一个文化民族而不是一个政治民族。他认为,时间序列上的“过去”从来不会真正地离开德意志人,文化在长期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心理模型、审美范式、经验视野和美感趣味将在德意志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在艺术史研究中摒弃线性的历时维度,诉诸共时的文化维度,试图勾画出德意志同历史上伟大希腊的精神联系,恢复德意志人的文化自信,塑造文化认同及民族认同。他认为德意志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是“迟到的民族”,但它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所拥有的力量终将为其在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一席之地。

即使奥地利在1801年2月与法国缔结了屈辱的吕内维尔和约,席勒依然用文化的力量去凝聚、提振民族精神。在《德意志的伟大》一诗中,席勒提出,尽管德意志在战争中遭遇了失败,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精神并没有坍塌。德意志人的崇高从不建立在帝王身上,而是深深根植于每个德意志人的德行中,建立在民族文化和性格之上。一个文化的德意志必将战胜线性时间,在所有民族的收获期铸就最大的辉煌。笔者还注意到,在席勒的这首诗中,出现了“时间之轮”的循环意象:“每个民族在历史中都有属于他的一天,/但德意志的那一天是所有时代的收获——当/时间之轮圆满,/德意志之日将显现。”^③席勒不仅将个体“永恒”寄托于类的生生不息中,更把这种循环时间观念沉落到历

①[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卫茂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80页。

②[德]席勒:《厄琉西斯的祭奠》,《席勒文集·I》,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240页。

③[德]席勒:《德意志的伟大》,《席勒文集·I》,第182、183页。

史领域。“时间之轮”从“黄金时代”开始启动,当“时间之轮”圆满之日,就是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复归“黄金时代”之时。席勒坚信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天,德意志民族的这一天将是所有时代的收获期,它将作为新一轮“黄金时代”的代表显现出来。

笔者认为,德、法两国的“古今之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选取何种路径完成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文学论争背后隐藏的更大的政治话语。法国“古今之争”表现出的与乐观历史进步论交织在一起的线性时间信仰,使法国在18世纪末走上了一条社会层面现代化优先的转型道路。而德国“古今之争”表现出的杂糅了“轮状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的文化时间观念,促使德意志选取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转型路径。同时,德意志人虽然大力推崇古希腊文化,但这种“文化怀旧”不是真的要回到过去,而是试图在“现在”落后的情况下从“过去”汲取资源,最终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一条从“文化现代化”迂回致达“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路径,也是一条“文化现代性”优于“社会现代性”的转型路径。也因此自启蒙时期开始,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建构就成为政治上分裂、经济上滞后的德意志人凝聚民族精神、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虽然以钟表为象征的“线性时间观”成为工业时代的典型意象,但笔者认为,作为第一种时间原型的“轮状时间观”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正因为它在精神层面的存在,每个民族的文化底色才不至于随着线性时间流逝而烟消云散,现代人才能够在共时层面上建立起与文化、传统之间的隐性联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日之中国亦走在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以何种时间信仰完成文化现代化转型,不仅关涉到对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理解,更是一个建构现代性文化认同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陆 林)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in German and French Liter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Time Concept

SHENG Bai-hui

Abstract: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in German and French literatures shows a concern over 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Due to various differences in history, traditions, economy, culture and geography, most French intellectuals believed in the linear concept of time and adopted a corresponding optimistic progressive theory of history, while their German counterparts, with reservations about such understanding of time and history, preferred a cultural concept of time, a mixture of the linear concept of time and a circular view of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such “looking back” cultural consciousness prevailed in Germany, accounting for their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ime concept, and the choice of a path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rather than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time concept; linear concept of time; circular view of time; German literature and French literatur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